

犹太难民画家的“诺亚方舟”

王勃

民国洋画运动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过程的重要写照。这一运动民国初年发端于上海，且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演进。陈抱一在《洋画运动过程略记》（1942）中指出：“上海方面洋画运动的开始。”而运动的开展是由本土洋画家、留学回国的洋画家、外籍侨民画家、文化界名人等不同社会身份的传播主体所做贡献勾连而成的。其中，上世纪30年代避难到沪的犹太难民画家就是一支重要力量。作为近代上海外侨特殊群体之一，犹太难民画家虽同民族而不同国，但实践着多样化的艺术移民路径，亦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功不可没。那么，上海缘何成为他们的“诺亚方舟”？他们具体是如何助力洋画运动的？其作品又有何特色？

战前的德国已形成了“歧视犹太人”的思想，后在全球经济危机及反犹太浪潮的影响下，这种风气更甚。尤其1938年“水晶之夜”后，纳粹在欧洲排犹愈演愈烈，迫使一批犹太难民画家背井离乡远赴上海。对于饱受摧残的他们而言，上海象征着希望与美好。因为上海是当时混乱局面下唯一一个无需签证的开放港口，也并未发生任何主观意愿上的反犹活动，大部分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能够安稳生活；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与犹太文化在某些方面相契，如均注重自身文化的传承发扬，重视家庭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等，在上海这座融合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城市，犹太难民画家获得了最有利的定居与谋生环境。

据相关资料显示，1933—1941年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地区的犹太难民，其中就包括200名左右的艺术家，他们生活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直到二战结束。以1939年11月“上海艺术家俱乐部”（Shanghai Art Club）的登记信息为参考，记录有150余名文艺从业者。次年，该组织重组为“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吸纳了更多的犹太难民画家及艺术爱好者。出于职业爱好与兴趣，这些人也颇为关注中国的艺术发展状况。他们不仅用画笔记录下最真实的上海，且借助美术社团的力量，利用展览等方式，实现与本土艺术家的深度交流。换言之，这些艺术精英丰富上海的文化内涵，推动上海本地艺术发展，渐而助力洋画运动。

具体而言，犹太难民画家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组织犹太美术社团、媒介宣传、教授西画等方式实践着



▲ 上海无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签发给白绿黑的出入证

西画东渐艺术移民的“第四条途径”。

笔者收集了犹太难民画家与美术爱好者组织的部分画展信息，其中，德籍的达维德·路德维希·布洛赫（David Ludwig Bloch，中文名白绿黑）和奥地利籍的弗里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中文名许福）是两位较为活跃的犹太画家。

“（白绿黑）水彩画的特征明确，能够呈现出视觉上明亮的感受，若能能够达到滋润柔和，轻淡缥缈，则可称之为上品……未来成就，实难限量。”（《新闻报》，1941年10月9日）这是温肇桐观白绿黑等“多人画展”后给予的肯定评价。随后三年，白绿黑先后策划举行“白绿黑水彩及木刻展览”及犹太画家在上海的第一、第二次联合画展。

而希夫“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把上海作为主要居住地，把远东作为他漫游主题的天地，他变得不仅在本地闻名，而且还名扬世界艺术圈子，主要是因为人们领悟到他每一个独特的色彩问题上的深刻反思”（The China Press, 1946年6月2日）。所以早在1943年11月，其个人油画展期间，媒体就赫然以“正在此地展出的油画展显示出本地漫画家多才多艺”为标题赞誉希夫“艺术本性全新一面”（The Shanghai Times, 1943年11月16日）。

犹太难民画家举行画展进行艺术交流，也试图吸引更多的观众、招徕可能的赞助人。他们组织了“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简称ARTA）。该会会员共有64名，包括画家及他们的友人。成为会员能够获得一件免费艺术品，如有购买行为可享受价格上的优惠。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入其他美术类社团，帮助提升社团知名度，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出版图书、发行刊物也是犹太难民画家利用媒介进行宣传实现艺术移民的主要途径。由字林西报出版的希夫与荷兰籍女摄影师爱伦·索贝克（Ellen Thorbecke）合作的Shanghai（《上海》）一书，1934年问世时即被认为“是艺术作品，充满怪诞的幽默，非常有人情味，具有美感”；同样由该报出版的白俄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Shanghai’s Schemezzle（《上海漫画》，1937）亦堪称是一部老上海的经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出版图书、发行刊物也是犹太难民画家利用媒介进行宣传实现艺术移民的主要途径。由字林西报出版的希夫与荷兰籍女摄影师爱伦·索贝克（Ellen Thorbecke）合作的Shanghai（《上海》）一书，1934年问世时即被认为“是艺术作品，充满怪诞的幽默，非常有人情味，具有美感”；同样由该报出版的白俄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Shanghai’s Schemezzle（《上海漫画》，1937）亦堪称是一部老上海的经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 白绿黑木刻作品《小户人家搬家》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值得注意的，一些犹太难民画家入美术学校或工作室教授西画，如被“上海艺术家俱乐部”和“名流创作室”聘为讲师，如希夫曾参与“上海漫画学会”。

（Elite Work Room）延聘任教的希夫，担任国立艺文院图案系教授的杜劳（M. Domracheff）、薛洛夫斯基（Shelovesky）等，他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西画教学效果。

此外，他们还致力于改进与提高上海建筑空间和平面设计水平。当时上海夜总会装饰领域出现的“玛斯奇”装潢等一些新变化就源自希夫的设计。而杂志封面设计的改进与提高，也有他们的贡献，如希夫创作的“《中国杂志》的新面孔，比用旧了老封面活泼得多，这些新封面展示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卡明斯基《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

“我（希夫）在那里（上海）生活的那些年里，不管年头好坏，无数图景和印象都像一部没有结尾、始终有趣、生气勃勃、引人入胜的影片不停地在我眼前滚过。”犹太难民画家创作了各种题材的作品，真实记录了当时上海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呈现的具有海派特性的事与物。

如希夫刻画的独轮车、黄包车、三轮车、自行车等人力交通工具和马拉的、骡子拖的、驴拽的交通工具，具有城市美食特色的各类食品担子，生老病死的人间百态，算命先生、代客书信等营生，构成了上海都市社会变迁与生活百态图景。

又如犹太难民画家以独特视角描绘的黄包车夫、风尘女子等常被忽视的人群，作品包含了对底层人群的关爱与同情。部分漫画更是针砭时弊、评议时事。1942年底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白绿黑《黄包车》黑白版画集，勾勒出这座城市中黄包车夫在不同场所、不同时刻下的形象，生动且具体地展示了黄包车夫生活的艰辛。

再如，犹太难民画家的部分创作诠释了难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希夫不仅在公开演讲和《上海日记》中多次提及他在上海难民社区的所见所闻，作品《难民》《逃难》等更是透着一丝“哀民生之多艰”的思绪。无疑，这些难民画家的画作是海派文化下的图像化语言，它们为后人了解中犹文化交流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海犹太难民画家是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背景下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从他们身上，不仅可窥见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和连接中西桥梁的城市特征，他们与中国艺术家更是在黄浦江畔共同谱写了中犹艺术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际对于城邦与秩序的看法注定有重大差异，由此也导致了不同的品性和行动倾向。人类虽然有史书和故事传承，但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不总能有效传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设定，要通过自己的真实生活来试错和积累，最后完成一代人的慈善故事。

第三个话题是政体。与后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没有系统讨论各种政体，但是政体却成为解释战争以及城邦表现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开始时，虽然他提出战争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但他同时借科林斯人之口，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政体与品性做了对照分析。因为古希腊的“政体”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涵盖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公民的品性，不同的政体会塑造不同的公民品性。科林斯人为鼓动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开战，故意说斯巴达人迟疑保守，而雅典人永远进取。在全书末尾，写到斯巴达错过攻陷雅典的一次绝佳时机时，修昔底德明确评论说，伯罗奔尼撒人是雅典人最理想的战争对手，因为“性格上的悬殊：一个敏捷，一个迟钝；一个敢做敢为，一个胆小怯懦”。修昔底德甚至还将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的失败也归为品性：（西西里的）叙拉古人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长与雅典人作战。

通过修昔底德的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他并不只是在记述战争，而是在多个层面探究人以及城邦的表现和动机，这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修昔底德是将政体视作影响城邦及其功业的基础解释变量。

修昔底德不仅撰写了一部战争史，而且还呈现了当时希腊世界的思考方式。透过希腊人的言行和表现，我们得以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去理解他们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在《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中，我尽可能挑选了修昔底德书中最为重要或者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议题进行拆解分析，一方面展示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揭示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的深入而复杂的思考。希望能够通过这本小书，为复杂的修昔底德思想提供一幅简易地图，并最终能够借着重理解修昔底德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小友王婉迪博士去年8月1日电话告诉我：吴文津先生早上5时多走了。我当时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4月中旬，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兄电话中还谈及，6月初他将会在斯坦福大学的事务结束后驾车去吴先生家，东方兄嘱我写一幅字或联句为吴先生百岁生日诞辰寿礼。我认真思考几日，据老人生平拟成联句：“巴蜀赤子百秩，厉马烽烟，漫溯行学，洵为经代文武；燕京牛耳卅春，搜囊函卷，礼聘鸿博，当乃不世哲贤。”后东方兄告诉我，吴先生看到后非常喜欢，他还说吴先生身体尚健，只是耳朵重听。我听后颇为欣慰。

吴文津先生御鹤西归，享年一百岁，这在世界著名图书馆事业家中也是非常难得的。在美国东亚图书馆学界，近一百年来，能称得上年高德劭的更是屈指可数，我以为是袁开明（1898—1977）、钱存训（1910—2015）、吴文津（1922—2022）三位当之无愧，他们是南州冠冕式的人物。

大约是1986年5月，郑培凯教授要回波士顿的家，他开车带上我，从纽约出发。次日，培凯兄带我去哈佛燕京图书馆。对我来说，“哈佛燕京”既陌生又有点神秘，那时专门介绍它的文章很少，尤其是藏书情况不得其详。虽然我过去在上海图书馆接待过前馆长袁开明先生，也为他介绍过馆藏的一些善本书，但那时的我仅知道哈佛燕京是一所学校内的东亚图书馆而已。

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大约是培凯兄事先告诉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我要去哈佛燕京访问的事，所以吴先生十分高兴。吴先生曾在1979年参加美国图书馆学界访华团，参观过上海图书馆，我也参与接待过这个团，但那时我对吴先生不十分了解，当然吴先生对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吴先生慈眉善目，微胖而不高，头发有些花白，但中气十足，一派学者形象。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询问了上海图书馆以及我的工作情况，还回忆了七年前访问上图的情景。

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期间共去过哈佛燕京四次，除第一次是去参观访问外，另三次都是吴先生专门邀请的，每次都是两个星期。第一次是吴先生嘱我将善本室大保险柜里的善本全数重新鉴定，并写出一份报告；第二次是让我将普通书库中的善本书挑出来；第三次是就其馆藏的明代闵、凌二氏所刻套印本写一篇文章。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当访问学者时，杨振宁教授时任石溪分校图书馆研究所所长。他经常鼓励我，当我将哈佛燕京的情况向他详述后，他即希望我写成文章交由杂志发表。没多久，我写成《拥书权拜小诸侯——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记》，约二万字，请杨教授审阅后投给香港《明报》月刊，后连续发了四期（1987年第6期至第9期）。

《访书记》中有一节写的是“哈佛燕京的功臣”，文中写道：“哈佛燕京能有今天的规模，并能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离不开袁开明和吴文津先生的。”“吴氏不仅是图书馆专家，而且是位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学者，工书法。1965年袁开明先生退休后，他接掌哈佛燕京，大力采购中国现代图书，强调近代、现代史料的收集。曾两次去中国讲学，为美国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和吴先生见过几次，曾听他谈图书馆的管理方法，极有见地。”我最后一次受邀去时，吴先生对我说：“谢谢你，过去还没有人这样来写‘燕京’的，而且写得这么详细。”

回到上海后，我因工作较忙，与美国方面联络很少。1990年4月，我和女儿赴香港与太太团聚，没多久，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香港图书馆工作了。次年2月某日，在图书馆编辑部办公室工作，又见到了中大馆吴培南馆长陪同过来参观的吴文津先生。吴先生邀请我一同晚餐，他正式告诉我，回美国后，会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请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两年，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1年5月30日，吴先生又来信邀我去哈佛。1992年4月28日夜，我们一家三口抵达波士顿罗根机场。吴先生为我们三人能够在这些不熟悉的城市里尽快适应，前后操了不少心，包括费心为我们找到合适的住处，这还远离家乡的我家人不能不为之中心感谢。

我在任访问学者的两年中，潜心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每天日课就是奋力完成三种善本书志写作。吴先生从未催问写作进度。每个月的第一天，我都会拿着一叠已完成的善本书志复印件去他办公室呈交于他。他也总是在表达谢意后说一句：“辛苦了，沈先生。”这些复印件就放在吴先生办公室进门处靠墙的书架旁，两年下来，居然有二尺多高了。

先师顾廷龙先生1996年2月23日有信致我，其中写道：“我有一事奉托，您便中留心搜集一点袁开明先生的遗事，他来‘燕京’，讨论分类，皆尚相契，颇欲写一点纪念文字。如果年隔已久，找不到了，亦就算了。袁之后任，是否即吴文津继任？吴延请您去哈佛，编撰书志，他有见地，亦能识人，为事业着想。忠于事业之人，最可钦仰。”

吴先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在他32年的任内，做了许多事情。他很早就被图书馆学界视作才人。1961年，吴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博士口试时，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即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加盟。1964年，吴先生还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哈佛燕京馆长袁开明先生即将退休，他向学校推荐了吴先生作为继任者，此举也得到了费正清教授的大力支持。吴先生1990年接受采访，被问到“一流图书馆馆长的任务为何”时，他一口气说了六条，第一条即为：“一所大学的研究图书馆必须要有一批不但具有图

图书馆长」的「愚公弄」的图书馆长沈津

图书馆专业知识，而且对于该馆未来所想发展的每一学术领域较有研究的菁英人才，从事馆藏发展工作。因此馆长的首要任务是罗致一流人才。”

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光临。吴先生作为馆长，难免有不少接待工作。他是一位十分节俭的人，但即使是公务应酬，也是自掏腰包以尽地主之谊。廉正自守、清风两袖正是吴先生人品、操履的体现。

吴先生很有人情味。他主持“燕京”时，中文部（采购、编目、借阅组）的同仁时有举行生日派对，吴先生往往会和大家欢聚一堂，嘻笑无我，全然没有了工作中望之俨然、不苟言笑的样貌。在图书馆工作的吴先生是西装、领带，仪容齐整，但在夏日的节假日里，他有时会在他“愚公弄”宅院那绿油油修整如一的草地上举行聚会，邀请馆内所有同事参加，那时的他却是T恤、运动鞋，一派闲装。关于“愚公弄”的来历，吴先生曾记曰：“寒舍居麻州卫斯镇四月巷一号，周君策纵过此，戏赠‘愚公弄’为名，雅俗兼容，友朋间遂传为佳话。”

1994年12月1日，我在吴先生的办公室里聊天。他告诉我，在大学时代曾读法文，开始很感兴趣，学了两年，一般的书可以读了，但后来不用，也就渐渐忘了。吴先生有时写文章或函复中国学者，都是用中文写作的，他下笔措词得体，叙述清楚，条理连贯，且书法工整，一看就知道是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学者所书。

吴先生是历史学博士，对近代史料文献的认识和收集是识途老马。他就聊哈佛燕京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过渡到利用社会科学进行“区域研究”。一些重要的近代史资料，如陈诚所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根据地的出版物、宣传品，就是吴先生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时收集到的，之后为哈佛燕京复制了一套。

我第一次访问哈佛燕京时，吴先生就将他发表在台北《汉学研究》上的抽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存藏现况》（1985年12月3卷2期）送给我学习。拜读之后，让我惊奇的是文中的数字和列表，信息量大，一目了然，让我感觉到哈佛燕京绝对不简单。这所大型大学志的收藏居然仅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之后，即使与中国大陆省一级图书馆相比，在数量上也在前五之列。

1997年12月6日，在燕京馆礼堂内，举行了第十二届中国文化研讨会年会，下午的会由郑培凯教授主持，主题是“书、读史、读人——坐拥书城的苦”，是为欢送即将荣退的吴先生举行的。我在会上说：“吴先生的退休对哈佛燕京及美国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个冲击和遗憾，他对燕京曾倾注了心血和心力，四处募款，充实馆藏，他是具有青年思想的长者。”他以推展新计划，使哈佛燕京一直保持全美东亚图书馆的龙头地位，而他“做别人不愿做、做不到的事”，正是他成功和受人尊敬的地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袁开明先生为后人留下了《袁开明文集》（程焕文编）及《袁开明年谱》（程焕文编），而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则有《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与《书剑万里缘》（王婉迪著）。要研究美国东亚图书馆史及二位先贤的事迹，上述图书是不可不读的。

吴先生对于他在哈佛燕京的工作，曾对我说：“我在图书馆领域做了那么多年，也不要求有什么好，但是对于图书馆的同仁来说，只要他们觉得、而且说‘吴文津做得不错’就行了。”我以为是吴先生功成不居、劳不吝功的境界。他在离开这座为之付出多年辛劳的殿堂时，带走的是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亲自颁给的表扬状，以及全美东亚图书馆协会颁给的1998年杰出服务奖。鲁登斯坦校长的表扬状上说：“我非常高兴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您致谢。你为哈佛做出了示范性的杰出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所更好的大学。”

德高望重、克尽厥职的吴先生离开了我们。作家博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天堂图书馆里，一定有了懂行的吴文津馆长。

